



罪与证

中国慰安妇实录

马建河 | 著

中国慰安妇——
二战时惨遭日军性奴役的
中国妇女
这些能够证明日军滔天罪行的
活证人正在一天天减少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罪与证

中国慰安妇实录

马建河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罪与证：中国慰安妇实录 / 马建河著. -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

ISBN978-7-224-11568-0

I . ①罪 … II . ①马… III . ①侵华 – 性犯罪 – 史料 – 日本

IV . ①K265.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68071号

出 品 人：惠西平

总 策 划：宋亚萍

策 划 编辑：刘景巍

责 任 编辑：王亚嘉

整 体 设计：白明娟

罪与证 中国慰安妇实录

作 者 马建河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邮编：710003)

印 刷 西安建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 ×1092mm 16 开 16.5 印张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9 月 第 1 版 2015 年 9 月 第 1 次 印 刷

书 号 ISBN 978-7-224-11568-0

定 价 39.00 元

序

所谓的“慰安妇”就是日军的性奴隶，“慰安妇”制度就是日本政府及其军队推行的军事性奴隶制度。这一定义，我在1999年出版的《慰安妇研究》中，已开宗明义进行了阐述，2001年我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二本“慰安妇”专著的书名，就是《日军性奴隶》。

日本军队在二战时期实行的“慰安妇”制度，与战时偶发的强奸罪完全不同。战争结束后，在战火所及的国家境内，到处留下了这支军队为性暴力的施行而搭建的房屋、窝棚，大量的受害女性被遗弃，甚至在使用过程中被残害。在这支军队指挥官的眼里，女性和粮食、武器一样，是战争时期必须使用的战略物资。

在“慰安妇”制度下，受侵略国的绝大多数受害妇女被强逼或欺骗入军，失去人身自由，充当性的奴隶，随时可能失去生命；而士兵之所以如此为所欲为，正是日本政府运用国家机器的力量，不惜牺牲女性的血肉之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他们作为杀人机器的能量，制度化地推进和维护了这一性奴隶制度。这是一种令人发指的兽性制度。所以说，“慰安妇”制度侵犯了人权，违犯了禁止奴隶交易的国际公约、人道法和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禁止强迫劳动公约》，违犯了国际惯行的保护妇女儿童权利的法规，违犯了关于禁止妇女卖淫的国际法，是一种明明白白的战争犯罪。

根据我们20年的研究，这一性奴隶制度不仅确实存在，而且有大量证据表明，当时的日军政府长期参与了运作。它从1931年萌芽，到1945

年日军战败覆灭，经历了 14 年。

由于日本战败时对“慰安妇”资料的销毁，甚至有些日军官兵给“慰安妇”服用氯化钾，从肉体上进行毁灭，又由于日本政府对战争责任认识的敷衍塞责，很多资料至今未公开，所以要揭露日本推行性奴隶制度的暴行，实地的调查就显得极其重要。我从 1993 年开始做“慰安妇”田野调查，并组织过几次有影响的国际联合调查，如 2000 年与日本学者联合对海南的调查，2003 年与朝鲜、日本合作邀请朴永心大娘从平壤—南京—云南龙陵的调查等，从而取得了许多独特的历史信息。

我与马建河认识时，他是《中原石油报》的记者，那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当时他为日本实施性奴隶制度的历史所震撼，决定系统调查。自 1999 年起，他背着照相机跋山涉水，从黑龙江到海南岛，寻访了三十多位“慰安妇”幸存者。他本着人道主义精神，立志要为幸存者们“拍照、录像、录音”。一个记者有如此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可以说是不多见的。

马建河先生的肖像摄影，有着独特的视角，那就是自然、真实。他尊重采访对象，善于用黑白照片来表达幸存者的表情和神态。这与某个摄影家坚持让幸存者摆拍、做出各种扭曲造型的作品，形成鲜明的对比，高下立判。

这本书中的采访对象，如刘面换、周喜香、张先兔、赵润梅、李喜梅、张五召、尹玉林、赵存妮、杨时珍、陆秀珍、朱巧妹、李光子、陈金玉、李连春等，我都探视和采访过，如今她们都已离开人世了。因此这些资料就显得异常珍贵。

期待这部书的出版，能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慰安妇”这一非常不幸的女性群体，并对目前中国大陆仅存的 25 名幸存者以更多的关爱。

苏智良

2013 年 8 月 15 日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前 言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2012 年 11 月 2 日对日本的人权问题发出劝告书，要求日本认真处理好“慰安妇”问题，并到 2013 年 3 月为止，就日军“慰安妇”问题和拘留设施建设等问题做出答复。

这是 2008 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机制启动以来，日本第二次接受审议。2012 年 10 月 31 日，日内瓦万国宫，79 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慰安妇”问题被突出地提了出来。先后有七个国家的代表就日军二战期间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问题表达了意见，比四年前多了两个。这七个国家是：中国、韩国、朝鲜、东帝汶、哥斯达黎加、荷兰和白俄罗斯。

而在中国，就在 20 天前，山西太原郑家寨村刚刚送走一位 90 岁老人尹玉林。她在世的时候，是中国最年长的“慰安妇”。如今山西 16 位公开对日索赔的“慰安妇”只有六位在世。

“慰安妇”——二战时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的活证人——正在一天天死去。日本政府拒不认罪，就是要看到这样的结局。

1999 年 10 月，从笔者开始第一天在全国各地寻访中国“慰安妇”至 2012 年底，其中的许多名已经含恨离世。

十几盘录音（像）带、600 多张底片默默地躺在干燥箱里，那是受害老人血泪的控诉，它在等待着拨云见日的那一天。

“慰安妇”制度，是日本政府和军队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的最耻辱

的记载。

在长达 15 年的侵华战争中，日军强行掳夺中国的良家妇女（除极少数是中国的妓女外）充当性奴隶——“慰安妇”至少 20 万人。北至中苏边境南到海南岛，只要是日军战区，慰安所就无处不在。这些被掳夺来的妇女不分昼夜地遭受日军的蹂躏，一人每天接待二三十人，其状惨苦。

由于中国长期缺乏对此问题的系统性研究和取证，致使联合国的“慰安妇”调查报告中有关中国“慰安妇”的问题竟告阙如。时至今日，日本政府和天皇仅对韩国、新加坡等东南亚诸国妇女充当“慰安妇”一事在各种外交和访问中表示了谢罪和赔偿意愿，唯独对中国“慰安妇”的问题表现出回避和沉默。

然而，中国却是“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国，也是“慰安妇”这一罪恶行为的始发地。

更令人不安的是，自 1992 年中国的第一位“慰安妇”上庭做证到现在，她们已有许多人陆续去世，她们年龄多在 75 至 85 岁之间，她们是活着的证人，是战争的受害者，因此，抢救中国“慰安妇”的文字及影像资料的工作已迫在眉睫。

本着人道主义精神，自 1999 年 5 月始，我自费调查中国“慰安妇”问题，并为尚在的“慰安妇”拍照、录像、录音——即便在进行过程中个人的感受是极其压抑、沉重和心痛的。

为拍摄高质量的照片，东拼西凑购买了一台 PENTAX645n 相机，从此，这台机器跟着我走南闯北。因为路费都是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有时还要贴补受害的老人，所以格外节俭。我坐过牛车进山，在火车站受过冻饿，步行十几公里从山西到河北；“二进山西”时，妻子已经临产，靠老妈照顾着，“四进山西”完成拍摄采访时，我的女儿也一岁了。

2000 年 7 月，我到温州乐清日报社任摄影记者。第二年趁春节放假，又钻进了山西。此后，每年的“五一”“十一”，我都跑到全国各地继

续对尚在的老人进行访问，先后到过黑龙江、海南、上海、云南等地。

谈到拍摄“慰安妇”的缘起，也许是机缘巧合吧。早在1999年，我在《大河报》上看到一篇文章——《他与19位幸存的“慰安妇”联手抗日》，这使我大为震惊。它不仅让我了解了山西张双兵的事迹，更重要的是我得知现在中国还有“慰安妇”的幸存者，而且是19位。如获至宝！我20多岁的时候，就知道“慰安妇”的事情。有一天，我在一书摊上看到了一本书《昭示：中国慰安妇》，作者为江浩，书中记载的中国“慰安妇”的悲惨经历让我极其震撼，从那时起我对这段耻辱的历史刻骨铭心。2001年许，我在浙江温州有机会遇到了《昭示：中国慰安妇》的作者江浩，与他谈起调查的动机，他说自己恨啊，“就像日本人去侮辱咱奶奶一样”，这也是促使他克服千难万险完成跨国调查的动力。但可惜的是，该书只有文字和极少的历史图片，并没有受害者的照片，或许是当时环境和条件不允许公开的缘故吧。

江浩如今已步入老年，当年他采访的许多老人现在已经是风烛残年，身体与生活状况也很不好，但官司却是刚刚开始。如何抢救历史？怎样帮助老人们打官司？我想到了用影像的形式，但录影自己是没有这方面能力的。于是，我就采用了摄影、文字及录音的形式。

最初，我只想做成《慰安妇证言》的形式，即对遭受日军性暴力的老人保留肖像和录音，今后老人去世了，也可用来和日本政府打官司。后来发现，这绝对是个幼稚的想法和做法。谁能证明它的真实性？老人死了，又有谁去做这个工作？太多的问题摆在面前。1999年底，我受邀在上海参加了中国慰安妇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发现许多人都在做这件事情，而且做得比我好，他们是完全凭着正义和民族自尊心在身体力行。一年以后，上海师范大学的苏智良、陈丽菲夫妇终于找到了一个真正的办法：请司法机关为老人做公证——这样的做法在历史上是首创。当然，这项工作确实非常艰辛，非常繁杂，夫妻俩遇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但他们仍然坚持着，这种坚持来自于他们的民族自尊心，来自于对那些受害者的尊重与同情，来自于对战争的憎恶。我对他们的举动无比敬佩，这也激励着我的采访继续着，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在采访拍摄中，我不回避受害老人的正面形象，我想努力用静止的照片抓住她们的灵魂，抓住她们的尊严。她们虽然遭受了蹂躏，但并不耻辱——耻辱的是日本政府；她们虽然遭受了苦难，但从没停止抗争；最终，她们坚强地活了下来，又顶着屈辱勇敢地站了出来，她们要日本政府认罪、道歉、赔偿，她们要警示世人，战争不再来！

2012年10月26日

目 录

罪与证——中国慰安妇实录

CONTENTS

山西：窑洞里的血和泪

一进山西：始自《他与19位幸存的 “慰安妇”联手抗日》 / 4

侯冬娥 / 11

刘面换 / 23

周喜香 / 31

张改香 / 35

陈林桃 / 41

二进山西：含恨九泉 / 46

张先兔 / 48

郭喜翠 / 51

赵润梅 / 56

李秀梅 / 59

李喜梅 / 64

张五昭 / 67

南二朴 / 70

尹林香、尹玉林 / 76

三进山西：鬼子尽往死里糟蹋咱们的媳妇子！ / 83

王变良 / 86

杨时珍 / 92

高银娥 / 95

四进山西：送魂声 / 99

王改荷 / 100

赵存妮 / 104

尚春燕 / 111

上海的控诉

万爱花 / 117

卓亚扁 / 122

黄有良 / 126

陆秀珍 / 130

朱巧妹 / 134

世界上第一个“慰安所”与冈村宁次 / 138

其昌栈慰安所 / 143

黑龙江：异国的鬼

李凤云 / 152

李光子 / 158

池桂兰 / 162

金淑兰 / 164

崔英子？英子？ / 167

要塞里的悲惨劳工 / 170

海南：“战地后勤服务队”真相

杨嫵榜	/ 181
黄伍肿（黄乌肿）	/ 185
陈金玉（陈母银）	/ 190
林亚金	/ 195
南林峒兵工厂、坑道	/ 202
谭玉莲	/ 204
谭亚洞	/ 207
邓玉民	/ 210

云南：炮火中的“慰安妇”

松山	/ 218
龙陵	/ 225
腾冲	/ 230

广西：孽

韦绍兰	/ 239
-----	-------

后记

山西：窑洞里的血和泪

SHANXI: YAODONGLIEXUEHELEI

1999 年至 2001 年，我多次经过乌河。

这是一条季节河。冬季，河水干涸，只留下硬邦邦的石头任由牛车、马车以及汽车从容碾过；夏季，雨水冲刷着两岸的黄土，形成一条又深又宽的峡谷和悬崖。

乌河，位于山西孟县北。源头为高庄，流经李庄、侯庄、西烟，然后在进圭画了个“几”字，紧接着形成一个乳头状凸起，最后北上流入滹沱河。当地有句顺口溜：“乌河水倒流，富贵不到头。”似乎生活在周围的人们注定是来世间受苦受难的。

千百年来，两岸百姓面朝黄土背朝天地生活着，他们与天抗争，与命抗争，与这片贫瘠的土地抗争。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军铁蹄践踏这里，隆隆枪炮声打破了生活的平静，他们遭受了血与火的洗礼。两岸山区民居以窑洞为多，一层层一洞洞，沿山而凿，逐级排列，而就在这世代居住的窑洞里，在抗战时期，不知吞噬了多少女性的贞洁和青春，使得苦难伴随了她们一生。

浑浊的乌河水，是两岸儿女的血和泪；干燥的乌河床，是两岸儿女被践踏的肌体。

乌河，不仅仅是一条苦难河，更是一条流淌着两岸女性屈辱的河，浊浪滚滚，呜咽悲鸣！



1

2

1.1999年拍摄的盂县某村庄，此时这里一片宁静与安详

2.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军从山西横渡乌河，开始了他们在山西盂县等地的残酷侵略。选自《血泪“盖山西”——日军山西性暴力十年调查》 |佚名 摄|

——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进犯山西。10月30日，素有“晋冀咽喉”之称的正太铁路重镇阳泉沦陷。

盂县位于阳泉北45公里处，西通阳曲、太原，北达五台、忻州，东连河北的平山、井陉，南临正太铁路，同外界往来方便，战略位置非常重要。

1937年10月中旬，八路军三五九旅抗日战地工作团建立了以盂县为中心的盂县、平定、寿阳、阳曲、榆次五县特委（对外称工作团）。特委在当地发动群众，秘密建立抗日政权，建立党组织，以配合八路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据1995年版《盂县志》记载：“至年底，全县发展党员547人，在53个村庄建立党支部，20个村庄建立了党小组。”“民国二十六年秋至二十七年（1937—1938）春，全县有950余名青年参加了八路军，120余名青年知识分子参加了决死队，90余名青年参加了县游击队。”特委“发展党员的对象主要是贫苦劳动人民、知识青年和学生。

党员活动是党员与党员单线联系，绝对保密”。

与此同时，盂县以北的五台一带正活跃着一支林彪、聂荣臻领导的抗日队伍——八路军一一五师，并于11月2日宣布成立晋察冀边区政府。

不幸的是，1937年12月16日，日军侵犯盂县，抗日组织遭到破坏，被迫转至隐蔽的上社镇。

此后，日军和八路军在盂县各地展开了各种类型的拉锯战，双方你进我退，你退我进，并各自发展力量，互相渗透。日军为了巩固占领区，出台了一系列新政策，如“肃正（整顿）建设”、“治安强化运动”、建立“自卫队”、扩大“经济封锁线”等。

1940年“百团大战”后，日军又推行“碉堡战术”，相继在河东、进圭等地设立据点、炮楼，并于1941年秋始把东庄头、瑙上以东抗日根据地的251个大小村庄划为“无人区”，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特别是1940年8月到1943年6月，日军一方面在占领区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另一方面调遣兵力，向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大扫荡。在不到三年时间里，就扫荡百余次，出动兵力数万人次，不仅动用飞机、大炮，还施放毒气。近八年间，日军在盂县制造的骇人听闻的重大惨案达23起，致使3万余人无家可归，数以万计家庭妻离子散。

日军占领盂县期间，共设有22个据点，其中西部3处：西烟、河东山和进圭。每一处都筑有炮台，同时配备30到50人的“警备队”。日本警备队在此驻扎期间，为满足士兵的兽欲，长期霸占、强拉、监禁、轮奸当地青年女子，并给予疑似共产党员和妇救会成员最严厉的刑罚或逼迫其作为性奴隶使用。

自1999年至2001年，我四次深入盂县西部小山村调查采访当年遭受日军强暴的受害者，听她们哭诉长期遭受日本北支那方面军第一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团独立步兵第十四大队所属中队以下的部队强暴、监禁、轮奸的种种经历。

一进山西：

始自《他与 19 位幸存的“慰安妇”联手抗日》

1999 年国庆节后的第二天，我从河南濮阳出发，中转石家庄，到达山西盂县——一个产煤的黑头黑脸的城镇。

走到盂县西北边界的西潘乡才算是真正进入了大山。山涧的小溪、白杨树，即将收割的谷子、高粱泛着金红色环绕在山坡上，几缕白云飘荡在天的最高处。公交车像一片树叶在盘山公路上飘来飘去，车后是滚滚尘土。这里是太行山西，地貌呈现出南高北低的特点。

5 月 20 日《大河报》上，一篇《他与 19 位幸存的“慰安妇”联手抗日》的专题稿，让我知道了张双兵——一个普通山村教师的不凡事迹，更令我惊诧的是中国竟然也有“慰安妇”，而且健在的竟有 19 位——且集中在山西盂县。在我的印象中，“慰安妇”只有日本本土的少数女子，以及韩国、朝鲜被骗来的女子，想不到中国也有！这些被打了引号的所谓的“慰安妇”实际上就是日军在中国占领区被强迫遭受性奴役的中国良家女子。

虽然，中国受害妇女一个又一个站出来起诉日本政府，但官司一直没赢。“更可怕的是，日本方面的判决一天天拖下去，老太太们的精神和身体也在一天天地垮下去，有五位老太太没有盼到云开日出，先后故去了。”我知道，受害老人就像即将熬干的油灯，没有风吹也会熄灭；我知道，受害老人是日军无耻罪行的活证据。

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媒体人，我所能做的就是记录老人的受害经历，以备呈上法庭作为罪证——当然，后来发现以照片和录音的形式是多么的幼稚！我利用节假日时间自掏腰包，将采访日程安排得满满的，马不停蹄地踏上了首次访问山西的路。

张双兵是我的向导，我必须得先找到他。

从西烟镇坐上汽车开始，我就开始打听张双兵。果然，知道他的人很多：“他是学校里的老师，我知道呢。”

车子到了赵家沟就不走了，加了十元钱才送我和一个领着孙子的老婆婆到距离西烟镇 20 公里的羊泉村。此时，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村口，有一中年人赶着牛车过来。

“那不是双兵么？”大娘告诉我。

这人黑瘦，着土黄衣衫，说话慢声细语，一看就知道是村里有文化的人。张双兵听大娘说是找他的，招呼道：“到我家歇吧，到我家歇吧。”

张双兵住的是窑洞，靠种庄稼和授课谋生，和妻子一起照顾着年迈的母亲和年幼的孩子。

一个小学老师，何以和“慰安妇”扯上关系？他是如何帮助老人的？这要从他发现中国第一个幸存“慰安妇”，有“盖山西”之称的侯冬娥说起。

1982 年 2 月，张双兵到高庄村学校任教。

这年秋天的一个下午，他带学生到田间劳动。此时已是秋收末尾，高粱、玉米都已被放倒，牛车、马车等在田间装载，偶尔田间燃起焚烧的青烟，这是一个忙碌的场景。这时的中国农村已经将土地“包产到户”，农民拥有了自己的土地，自然热情高涨。

突然，他看到山坡上有一处庄稼地还满是一片金红色的高粱，像秃子头上留的一撮毛，让他疑惑的是地头竟然有个老妇人在跪着收割，看起来非常吃力。他问学生们谁认识那个老人，其中一个回答：“是河东的，听说是进过炮楼的。”